

多维文化视域下的

京派文学研究

文学武〇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本书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多维文化视域下的京派文学研究》（10YJA751086）资助

多维文化视域下的
京派文学研究

文学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维文化视域下的京派文学研究/文学武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3. 5

ISBN 978-7-5473-0580-5

I. ①多… II. ①文… III. ①京派—文学研究
IV. ①I209.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1527 号

多维文化视域下的京派文学研究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 230 千

印 张: 16.5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580-5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52069798

序

学武君是我早期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之一。记得1994年我就只招了他一人,那时的博士招生人数很少,因此指导的时间较多,对他的了解应该说也是较深的。

学武君曾告诉我,他父亲受到历史的牵连被打成了所谓的“右派”,全家因此获祸被赶到农村。后来虽然他父亲得以平反重返工作岗位,但因为家庭负担太重,无力资助他继续求学,就让他初中毕业进入一所免费的师范学校就读。但学武君在学业上很有追求,毕业几年后在他同乡、也是我的第一个博士黄昌勇君的鼓励下认真备考,考取了东北一所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他的两位硕士导师彭定安、陆文采对他也是关爱有加。当时我就想,这样一个能吃苦的学生一旦走上学术的道路应该会学有所成的。后来他选择京派小说做博士论文,对此我很支持。整个三年准备博士论文期间,他都按照我指导的思路,一方面去啃他所欠缺的理论书籍,以提升思维的超越性;另一方面花费大量的时间待在图书馆的旧期刊资料室搜集原始的材料,以保证资料的实证性,进而把两者较好地融为一体。他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因此在答辩时以优等的成绩通过,当年担任答辩主席的贾植芳先生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斗转星移。不知不觉间十几年过去了。值得高兴的是,学武君毕业后就一直在上海工作,每逢有机会来复旦他总会到我这里聊一阵,告诉我一些学术界的动态和他的近况。我因为年老多病,和外界处在近乎隔绝的状态,对他所讲的事情也很有兴趣。他是一个朴实、正直的青年,每每谈及学

界的腐败现象总是激愤溢于言表,这些我虽有同感,却也总是劝他心平气和一些。让我尤为感动的一点是,虽然他踏入工作多年,却仍然对学术研究充满敬重和挚爱之情。据我所知,学武君当年的同学有不少已经官至国家司局级干部,更有很多成为校长、院长之类的学术行政领导。他自己也曾经有这样的机会,但最终感到与自己兴趣不合放弃了,颇有陶渊明“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味道,然后躲到上海一所著名高校默默地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至少就我的目力所及而言,像他这样痴迷于学术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学武君在学术上的起点是比较高的。在读博士期间就发表了多篇论文,很早的时候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长篇学术论文。尤其是最近几年,他在学术上的表现更让人多少有些吃惊:接二连三地在国内数家著名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学术专著更是一部接着一部出版。去年他把自己的专著《风雨中的野百合》和《京派小说研究》送给我,读后顿有耳目一新之感,我由衷地感到一代学人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前些日子他告诉我,国内一家知名的出版社就要出版他的另一部新著,嘱我写序。作为他的导师,我于情于理都有义不容辞之责。

这部《多维文化视域下的京派文学研究》是学武君申请教育部项目的最终成果,也是他多年在这个领域研究的学术结晶。我粗略看过书稿,觉得作者对京派文学各个领域进行了综合、系统、比较的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坐标上充分揭示了京派文学的历史贡献,其在理论框架上也显示出作者的独具匠心之处。全书二十个章节看似在论述京派文学的不同侧面,彼此独立性很强,但同时它们却又互相关联,构成内在的逻辑体系,进而编织出一张京派文学的大网。很显然,要驾驭这样难度较大的研究对象,需要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储备和长期的研究积累,让人欣慰的是,学武君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说,这部专著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开拓、新的发现。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学武君对于前人普遍忽略的现代文论着力甚多,这些突出体现在他对京派文学批评家朱光潜、李健吾、梁宗岱、李长之、沈从文的论述中。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界一直存在着重

小说、诗歌等文体研究而轻文论的传统,这些年更是对文化研究趋之若鹜。我当然也赞成这种研究,但总觉得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研究无形中被忽略了,只有为数很少的学者在这些领域辛勤耕耘。我想,这大约是因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本身很枯燥,而对批评者自身要求又很高的缘故罢了。让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学武君所供职的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先生毕其全部的精力投身于中国现代文论的个案研究之中,立志要嫁接起由复旦大学郭绍虞、朱东润等先生开创的中国文论研究传统,创立起特色鲜明的上海交通大学学术流派。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学术工程,也是对中国现代学术的深层开掘,而学武君在京派文论的研究无疑呼应了夏中义先生的创想,其蕴涵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当下的中国学术界普遍充满了浮躁的情绪,很多人热衷于各种项目、名誉的争夺,少有人把学术作为体现生命个体价值的象征去守护。在这样的环境中来审视学武君的研究,其更多地有着一一种生不逢时的尴尬。所幸学武君一向以陶渊明、陈寅恪等人的人格作为理想,愿意过着寂寞而又清贫的生活,在这些文章中,高明的读者也一定能体会到一颗高傲而又孤独灵魂的悸动。

是为序。

陈鸣树

2012年8月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序 / 1

第一章 京派文学与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空间 / 1

第二章 朱光潜与京派文学 / 12

第三章 汪曾祺与五四文学精神 / 24

第四章 论京派小说的现代性意识 / 35

第五章 京派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 49

第六章 京派小说与中国艺术精神 / 59

第七章 悬崖边上的树

——对汪曾祺小说民间文化形态的一种考察 / 70

第八章 瓦雷里与梁宗岱诗学理论建构 / 80

第九章 突破与超越

——梁宗岱与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现代性 / 92

第十章 梁宗岱诗学与中国艺术精神 / 107

第十一章 接受与疏离

——李健吾与西方印象主义文学批评 / 119

第十二章 徘徊在现代与传统之间

——李健吾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 / 131

第十三章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诗学理论建构

——兼论朱光潜《诗论》的独创性 / 145

第十四章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创造性转换

——以朱光潜《诗论》为中心的研究 / 157

第十五章 李长之与中国现代独立学术品格

——写在《鲁迅批判》出版 70 周年之际 / 170

第十六章 沈从文文学批评论 / 182

第十七章 朱光潜、梁宗岱诗学理论比较论 / 190

第十八章 貌似而神离

——李健吾、沈从文文学批评比较论 / 212

第十九章 用美和生命孕育的一部大书

——论沈从文的湘西散文系列 / 227

第二十章 论汪曾祺散文的文化意蕴 / 237

附录 京派文学大事年表 / 243

后记 / 251

第一章 京派文学与中国现代 都市文化空间

京派文学不仅是一种文学流派,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存在和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空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状态。京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定的历史时期,其成员活动的公共空间以及所依赖的文化机制如报纸、杂志、书局、学校、社团、沙龙等都是现代都市文明的产物。“对话是城市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是长久的青藤上的一朵花。城市这个演戏场内包括的人物的多样性使对话成为可能……城市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社交圈子的扩大,以至最终使所有人都能参加对话。不止一座历史名城在一次决定其全部生活经验的对话中达到了自己发展的极顶。”^①他们正是凭借这样的都市空间编织着文学的理想,进而形成流派特征鲜明的文学社团。这些特征,如果把它还原到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则是可以清楚地看出的。



20 世纪 20、30 年代,由于文化环境的宽松、宽容,尤其是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为代表的高校所形成的自由、民主的空气和良好的学术环境,北平充满了活跃的文化和学术氛围,成为无数知识分子梦想的精

① [美] 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8、89 页。

神高地和家园。知识分子议论时政、张扬理想、创办同仁刊物、组织文化沙龙等,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北京集中了全国第一流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是现代中国知识生产和学术生产网络的枢纽,具有适合温和的自由知识分子生长的、以国家稳定的知识体制为背景的文化空间。”^①这样的伊甸园吸引了大批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人,如胡适、朱光潜、梁宗岱、梁实秋、闻一多、朱自清、林徽因、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林庚、何其芳、俞平伯、冯友兰等。这些知识分子以学校、同乡、同学、师生等诸多关系形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文化交往空间,他们彼此交往,在文化上也互相认同,进而形成文化群体和社团组织,构成了一幕幕活生生的文化图景。这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以周作人作为中心形成的语丝社群体、以林徽因“太太的客厅”、金岳霖的“星期六茶会”、朱光潜家慈慧殿3号的读诗会以及来今雨轩的聚会等文化空间形成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

周作人由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知识界成为一个重要的公众人物,说他是京派前期的盟主并不为过,因为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文人如废名、俞平伯、孙伏园、沈启无等,并以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文学理想深深影响了他们。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去不久,就开始倡导文艺的宽容,进而提倡闲适文学,自己也开始一步步经历从“十字街头”到“象牙之塔”的转变。这个时期的周作人交往圈子是比较小的,但他对俞平伯、废名等却始终关注,保持着紧密的私人友谊,在30年代会见日本记者采访时周作人说过自己最得意的门生就是俞平伯和废名之类的话,这其实从他们大体相同的文学理想和频繁的交往中可以见出。如他在回忆废名的文章中说:“废名当初不知是住公寓还是寄宿舍,总之在那失学的时代也就失所寄托,有一天写信来说,近日几乎没得吃了……从西山下来的时候,也还寄住在我们家里,以后不知是那一年,他从故乡把妻女接了出来,在地安门里租屋居住。”^②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们

① 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② 周作人:《药堂杂文·怀废名》。

两人的交情非同寻常。废名本来在五四时期对社会、人生都抱着关切的态度,但在周作人影响下也走上了隐居的道路,其创作充满的闲适、隐逸思想不止一次地得到周作人的赞赏。俞平伯的《燕知草》、《杂拌儿》等问世的时候,周作人也逐一写序进行评论。而废名对周作人的提携也心怀感激之情:“我在这里祝福周作人先生,我自己的园地,是由周先生的走来。”^①俞平伯在周作人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名关押的时候与其他的一些学者向国民政府法院呈文,为周作人说情,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彼此的紧密关系。

对京派文人而言,尤其是在20年代后期及30年代的北平,他们更多的文化记忆是以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朱光潜“慈慧殿3号”、来今雨轩公园等场所所构成的“公共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一批中国现代的自由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化和城市精神的建构,其孕育的文化精神多年后还留存在人们的心里。林徽因不仅出身名门,而且本人具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和学术背景,充满着女性的魅力;同时她也是北平文化圈的活跃分子,热心组织各种文化沙龙活动,以她家的客厅为中心聚集了当时北平一大批富有文学及学术活力的知识群体,甚至包括部分的外国人如费正清、费慰梅。在京派文学形成的历程中,林徽因个人独特的魅力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美国人费慰梅曾是林徽因家的常客,她的回忆见证了这一点:“其他老朋友会记得她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地长于写作。她的谈话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民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和领袖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们总是为她天马行空般的灵感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句而倾倒。”^②这个文化沙龙里的来客,大多身份特殊,多半都受到东西方文化的熏陶,在高等院校任教,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置身于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推崇自由主义精神,推崇艺术的美

① 冯文炳:《〈竹林的故事〉序》,《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② [美]费慰梅:《回忆林徽因》,《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页。

和真的准则,在无形中影响到不少作家的成长,其中有的成为京派文学的中坚力量如沈从文、萧乾、梁宗岱、卞之琳等。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交往过程中,不同领域、不同观点的碰撞和交锋具有了跨文化的特征。

与林徽因“太太的客厅”具有类似文化功能的是朱光潜家组织的读诗会,地点在他家居住的慈慧殿3号。1933年,朱光潜从欧洲留学回来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经常邀请一些诗歌的爱好者到他家参加朗诵诗会。与林徽因“太太的客厅”颇具欧洲文化沙龙不同的是,朱光潜的住地充溢着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而且人员大多是文艺界人士。虽然慈慧殿幽静偏远,但在朗诵会上的气氛却十分活跃,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争吵。实际上朗诵会的形式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这从梁宗岱、朱湘、闻一多、卞之琳、废名、曹葆华、冯至、林庚等的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五四初期白话诗人胡适、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等人的超越。

京派文人的这种文化沙龙活动对于文学来说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①当时由于民国政府迁都南京,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转移到南京和上海一带,作为古都的北平政治功能大大弱化,但其文化功能却完好地保留下来。因而京派文人所赖以生存的空间就出现了极为有利的局面,大致相同的政治信仰、教育背景、文化背景和艺术追求使他们聚集在一起,这是京派文学生存的文化土壤。

二

除了上面提到的京派文人以沙龙、私人关系所组成的那些公共空间因

① [法]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素,考察京派文学与中国现代期刊的关系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更清晰地梳理这个文学团体所依赖的公共舆论空间。大众媒介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产物,它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也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形态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可以说它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渗透到现代文学领域,这其中就带来了报纸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文艺书籍等的繁荣和发达。它们和传统的作坊式的出版印刷有质的差别,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形成了具有象征性的公共空间。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曾经分析过大众传播媒介的特征:“一份报刊是在公众的批评当中发展起来的,但它只是公众讨论的延伸,而且始终是公众的一个机制:其功能是传声筒和扩音机,而不再是信息的传递载体。”^①对知识分子来说,报纸等媒介不仅可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参与到社会进程中来,也提供了聚集同道的机遇,进而形成志同道合的文人集团。李欧梵认为在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对社会舆论的影响,“这种论述方式,事实上已经在开创一种新的社会的空间,而从这种新的空间基础上建立‘新民’和新国家的思想。”到了五四时代,现代媒介的作用更加被知识分子所看重,以此参与社会理想的构建:“知识分子的精英心态更强,总觉得自己可以说大话、成大事,反而不能自安于社会边缘,像早期‘游戏文章’的作者们一样,一方面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来作时政风尚的批评,一方面也借游戏和幻想的文体来参加‘新中国’——一个新的民族群体——的想象缔造。”^②京派作家所依赖的文化媒介载体主要集中在《大公报》文艺副刊、《骆驼草》、《水星》、《文学杂志》上,他们也有少量作品发表在《文学季刊》、《文艺月刊》上,而这些刊物诞生在中国政治、文化环境相对宽松的时代背景下,在一定程度上能真实表达知识分子的声音,具有了媒介的独立立场,从而在客观上繁荣了文学流派。有学者在研究北平当时知识界的文学公共领域时也提到这些刊物的作用:“对于 1930 年代的北平来说,除

① [德]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0 页。

② 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 年第 10 期。

了上述的政治公共领域之外,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个类似哈贝马斯分析启蒙时代欧洲社会时归纳出的文学公共领域。与欧洲历史相似的是,这个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依赖‘虚构性’的文学得以建立,围绕着《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水星》等报纸杂志,一个以北平学院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公共空间逐渐产生,并形成了一个社会来源广泛的‘阅读观众’。”^①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就会发现,《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创造》季刊与“创造社”、《新月》与“新月社”、《现代》与“现代派”、《七月》与“七月派”、《战国策》与“战国策派”等都有着紧密的关系。限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只重点分析《大公报》文艺副刊及《骆驼草》的文学思想、作家队伍构成、历史发展轨迹等,而这些是构成文学流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大公报》文艺副刊是中国现代最为著名的报纸文艺副刊之一,尤其是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新青年》南迁、《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等停刊的环境中,《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当时北方举足轻重的一个文学舆论空间。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办初期,身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吴宓担任这个副刊的主编。虽然吴宓标榜“中西文学、新旧道理,文言白话之体,浪漫写实各派”兼容并包的办报方针,但由于根深蒂固的古典人文主义立场及对新文学的偏见,这个副刊并没有凝聚起知识群体,尤其没有得到现代作家的积极响应。这种情况直到 1933 年沈从文和杨振声共同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才得到根本性的改观。沈从文痛感一些作家由于受到商业精神的影响而对文学的游戏媚俗的态度,在就任不久就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同时也鲜明地亮出了自己其实也是京派文人的大旗:“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的去做。”其后萧乾接手主编副刊时,把消遣性专栏“小公园”也成功地改造成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纯文学刊物。

对于《大公报》文艺副刊而言,杨振声、沈从文、萧乾是几个特别值得提及的人物,他们以自己坚定的文学信念、精辟独到的文学鉴赏力以及知识

^① 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34 页。

分子谦和宽容的文化气度吸引了一大批的作者群,推动了他们的成长。在他们几位负责“文艺”专栏的时期,发表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如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陈梦家、林庚、林徽因、曹葆华、孙毓棠等人的诗作、沈从文的《箱子岩》、林徽因的《横影零篇》、萧乾的《蚕》、芦焚的《阴影》等散文、小说以及李长之、萧乾、朱光潜、李健吾、沈从文等的评论,这些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浓重的一笔。

另一份京派文学著名刊物是《骆驼草》。这份刊物是以周作人为中心的早期京派作家创办的,同仁刊物的倾向非常明显,在上面发表作品的始终是围绕周作人身边的废名、徐祖正、冯至、俞平伯、梁遇春、程鹤西等少数人。《骆驼草》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它对早期京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贡献都很大。它的办刊宗旨是和周作人倡导的性灵闲适文学的主张相吻合的。如《骆驼草》发刊词明确地说:“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骆驼草》出版后由于它倡导的远离现实的文学主张遭到了一些人的抨击,而《骆驼草》的同仁们几乎步调一致地站在同一立场进行反击,俞平伯、废名等发表一系列文章为《骆驼草》实质上也是为周作人辩护。从其发表的作品看,像岂明(周作人)、俞平伯、梁遇春等的散文,冯至的诗歌,废名的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和《桥》等作品也都和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大体一致,风格冲淡平和,周作人是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影响到了这个刊物。《骆驼草》的创办为这个知识群体提供了合适的舆论空间,从而使他们的文学影响得以产生。

三

京派文人不仅以文化沙龙、期纸杂志等形式组成公共网络关系,而且他们还利用自己掌控的资源,通过有意识的文学组织活动,比如评奖、编选作品集、组织书评和文学批评等文化领域的空间彰显他们的影响和权利,

这同样能在一个侧面证明他们大致趋同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情趣。

对于京派作家的同仁来说,1936年以《大公报》文艺奖金事件为标志的文学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他们作为一个相对成熟文学流派的集中亮相,向世人宣告他们在文坛不可忽视的存在和地位,他们甚至能够利用现代媒介的强大力量对文坛进行干预和引导。这虽然和1949年后通过国家组织等行政手段干预文学的方式、强度不一样,但其结果仍然是借助外部的力量来影响文学的自身存在方式。1936年9月1日为纪念复刊后的《大公报》成立十周年,《大公报》决定举行纪念活动,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组织《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关于这次评选的初衷和经过,作为当事人的萧乾在他的回忆中有详尽的记载:“这种奖金原拟每年评选一次,由报馆每年拿出三千元来,以一千元充文艺奖金(奖给一至三人),以两千元充科学奖金(奖给一至四人)……‘文艺奖金’的裁判委员请的主要是平沪两地与‘文艺’关系密切的几位先辈作家: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和武汉的凌叔华。由于成员分散,这个裁判委员会并没有开过会,意见是由我来沟通和协调的。最初,小说方面提的是田军的《八月的乡村》。经过反复酝酿协商,‘投票推荐’,到1937年5月公布的结果是:小说:《谷》(芦焚);戏剧:《日出》(曹禺);散文:《画梦录》(何其芳)。”^①这上面名单透露的信息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京派作家主导了这一次的评奖活动,虽说是面向全国的文艺征集评奖活动,实际上带有倾向性,说其是京派文学奖似乎并不为过。从评委名单看,杨振声、朱自清、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朱光潜、凌叔华都是京派文人沙龙场所的活跃分子,是典型的京派文人。而靳以、巴金当时从上海来北京编辑《文学季刊》,和京派文人联系密切。再看获奖名单,何其芳和芦焚是京派作家当无问题,曹禺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京派作家,但他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也经常参加京派文人的聚会。因此,1937年公布的《大公报》

^① 萧乾:《〈鱼饵论坛阵地〉——记1935至1939年〈大公报·文艺〉》,《萧乾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7、428页。

文艺奖金名单已经清楚证明了京派文学的不俗实力。

不仅如此,《大公报》文艺副刊还邀请林徽因编选《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为此,《大公报》还连续为这套书的出版大做广告。《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一共收入小说 30 篇,其中大部分作家与京派文人集团有关联,比如沈从文、杨振声、林徽因、李健吾、老舍、芦焚、凌叔华、萧乾、杨绛等。当然这些人的作品能够入选,还在于他们作品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与京派文学的追求是一致的。林徽因这次编选的是第一辑,本准备继续下去,后来因为战争爆发而作罢,但这可看做京派文学创作实绩的一次集中展示,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培育青年作家、引领文学潮流的作用。

这种文学流派的倾向最后还表现在京派批评家对其同仁的文学批评上。这是文学圈内的交流、切磋、推介和批评的活动,在这样的文学批评视野中,一批优秀的京派作家作品脱颖而出,其价值最终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京派批评家本身所具有的宏阔的知识视野、精深的学术功力及独到的学术眼光保证了其批评的水准,这一批人的存在对于京派文学自身的发展和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周作人作为文学批评家,他关注最多的是其身边的废名和俞平伯这两位京派作家。为了这两位弟子的成长,周作人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他们写的评论包括《〈竹林的故事〉序》、《〈桃园〉跋》、《〈枣〉和〈桥〉的序》、《〈莫须有先生传〉序》、《〈陶庵梦忆〉序》、《〈杂拌儿〉跋》、《〈杂拌儿〉之二序》、《〈燕知草〉跋》等。他对废名的评价甚高,说:“我觉得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中国小说界有他独到的价值者,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①当时废名创作的《莫须有先生传》很少能被人看懂,而周作人撰文为之辩护:“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地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同样用白话文写文章,他们所写出来,却另是一样,不像

① 周作人:《〈枣〉和〈桥〉的序》,《苦雨斋序跋文》,第 107 页。